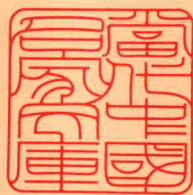


当代
——
中国
——
名家
——
文库



处在夹缝中的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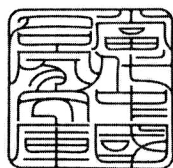
——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先达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
——
中国
——
名家
——
文库



处在夹缝中的哲学

——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陈先达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陈先
达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
(当代中国名家文库)
ISBN 978-7-303-15783-9

I. ①处… II. ①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2991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CHU ZAI JIAFENG ZHONG DE ZHEXU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37.5
字 数：550千字
版 次：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8.00元

策划编辑：饶 涛 责任编辑：饶 涛
美术编辑：毛 佳 装帧设计：耿中虎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孙文凯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闻道犹能以身求^{*}

(代序)

少壮青丝暮白头，倚马才情空自畴。
晚年多病寻常事，懒寻旧梦少回眸。
为文喜读风雷笔，结交最敬雨同舟。
书生老矣难荷戟，闻道犹能以身求。

这是陈先达教授 2001 年春住院时诗作中的一首。“闻道犹能以身求”，不仅表现他壮心未已的情怀，也是他长期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真实写照。

陈先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 1956 年至今，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一直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的前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探索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出来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早在 1963 年，陈先达在《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一文中，就对真理验证标准问题上实践检

^{*} 本文原载于《高校理论战线》，2001（9）。

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对实践标准和逻辑证明的比较研究，他不仅明确得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论，而且对逻辑证明在验证真理问题上的作用和界限也给予了正确的界定。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学术界最早探讨这一问题的文章。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理论界对“文革”反思的深入，马克思的早期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理论分歧也很大。正在这个时候，陈先达推出力作《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与靳辉明合著，北京出版社，1983），以大量的事实和深刻的分析阐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进步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对青年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深刻并富有说服力的论证。该书有力地驳斥了“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谬论，对澄清当时的思想混乱起了很大作用。该书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学术专著，由于其立论严谨，观点独到，逻辑性强，曾获得多次学术大奖。迄今为止，在我国该书依然是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权威著作和必读书目。

8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术界出现《手稿》热，有的人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宣传异化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观点。陈先达结合现实先后发表了《评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4），获北京市优秀论文二等奖）、《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出发点》（载《哲学研究》，1984（3），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论文一等奖）等一系列文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质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对人道主义唯心史观的超越与创新，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新发现”作出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和批判。文章发表之后被多次转载，影响很大。这些文章后来都被收入《陈先达文集》中。为了在大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史的普及工作，陈先达还参与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1982），主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1988）等教材，这些教材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学术品位很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就是国内第一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综合研究的专著。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先达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造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大胆地探索和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走向历史的深

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该书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国际共运史等各个学科，汇集了中外学术界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陈先达学术生涯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当代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一部扛鼎之作。在这本书中，陈先达以其对材料卓越的驾驭能力、精彩的语言表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马克思历史观形成与发展、理论与历史的立体图景，阐释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该书出版之后即获得广泛好评，先后被授予“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特等奖”等多项大奖。

《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是陈先达与他的几个博士生合作撰写的又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力作。该书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如何克服和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这一角度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修正”、“重建”、“补充”、“肢解”马克思理论的种种伎俩，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一般规律和特点。该书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画卷，为人们辨别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实则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提供了思想武器。该书获得华东地区图书一等奖、吴玉章奖一等奖。

20世纪90年代以后，陈先达的研究工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其重心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史向更广阔的社会人文领域转移。反映这一时期思想探求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漫步遐思》、《静园夜语》、《静园论丛》以及他参与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一书。在这些书中，他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开始熔为一炉、贯通一体，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个性。与此同时，他的文风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新活泼而又幽默风趣的语言，使枯燥深奥的哲学在他那里变得鲜活而生动起来。《漫步遐思》、《静园夜语》两书可以看作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两本书中，作者的论述涉及了当代哲学界争论的几乎所有前沿问题，但在书中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对生活常识的深刻洞察，作者用最浅显的语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述出来。至于作者在书中所涉及问题的领域之广，论证语言的内在逻辑

辑性之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陈先达的著作“把哲学的深沉、文学的优美、历史的丰富结合在一起，因而专业哲学工作者不会认为肤浅，非哲学专业的人也会引发哲学的兴趣”（哲兵：《熔哲史文于一炉的佳作》，载《广东社会科学》，1998（5））。

陈先达在哲学上的成就不仅显示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也表现在他的诗词中。陈先达的诗和哲学一样有着很深的造诣。他特别擅长格律诗，他的诗既有表达其信仰的政治性很强的诗，也有关于做人的人生体悟的诗。前者如在苏联解体时他写的一首诗：

问君此刻意如何？长夜无眠且放歌。
西风残照红旗落，北国英灵涕泪多。
无边战骨埋荒草，连片别墅阔人窝。
水行地底静寂寂，俯身侧耳有洪波。

他的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的诗，则充满了对这位伟大领袖一生救国救民业绩的敬意：

神州百年忧患多，黑夜难明叹沉疴。
名园灰烬奇耻绝，南京屠城尸塞河。
疮痍满目金瓯碎，国弱民穷奈敌何。
南北挥师千回战，时人犹唱《大风歌》。

后者如他在《难得明白》一诗中，所表达出来的淡泊名利，安于坐冷板凳的平常心：

人到老年吊唁多，生生息息可奈何。
莫为虚名伤身体，切忌争利失人和。
长生无药心有药，恬淡宁静少病魔。
年过六旬方悟得，明白原是处世歌。

在一次生病卧床之际，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对生死问题又进行一次

具有诗意的哲学思考：

智者何须忧死生，世间无物可永存。

寿数岂独长为贵，体用不二最上乘。

王勃早逝名千古，庾信文章老更成。

休嗟枝头春色杳，落花尚可香泥尘。

在哲学中有诗的意境，在诗中有哲学的探索。陈先达的哲学研究融科学家的理智与诗人的悟性于一体，其诗词创作兼具文学的审美情趣和哲学的批判精神。哲学如诗，诗中有哲学，二者相映成趣，构成了陈先达的哲学品格的重要方面。

陈先达的哲学思想深邃而广博，其治学领域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现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哲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三方面进行简要概述。

（1）关于马克思主义史

第一，关于马恩关系问题。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目前学术界争论的一个大问题，先后出现了“马恩对立论”、“马恩互补论”、“马恩各异论”等多种观点。对此陈先达提出了“共创论”。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创互补’的关系，正是他们的共同创造和各自的特殊贡献，才使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诞生成为历史事实”（《静园论丛》，364页，以下简称“论丛”）。他具体论证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创立和应用多方面的贡献，指出：“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个从社会主义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进行了考察；第一个论述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第一个全面研究了自然辩证法和军事辩证法；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此等等。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贡献。”（论丛，372页）对于西方喧嚣一时的“马恩对立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神话、反对恩格斯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马恩对立，无非是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马恩对立论更具有

蛊惑性和虚伪性，他们扬马抑恩以示客观公正，把实际的政治目的和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隐藏在繁琐的学术考证和比较研究之中。”（论丛，365页）

第二，关于异化理论的评价问题。陈先达认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说《手稿》是创立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开端，那么异化劳动的理论则是当时把这三者统一起来的集结点”（《陈先达文集》，23页，以下简称“文集”），“马克思把劳动引入历史，为历史观找到了坚实的基础”（文集，27页）。但是异化劳动理论本身又是有缺陷的，不能代表马克思的成熟思想。异化劳动理论并没有使马克思获得对历史本质的真正把握，因此它只是处于过渡中的理论。马克思在自己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巨变，第一次是从异化到异化劳动的转折，第二次是从“个体和类的矛盾”到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在这两次巨变中，马克思对异化的理解完全不同。“马克思异化观……经历了从异化的客体进到主体，又从主体回到客体——分析经济关系——的过程。”（文集，42页）因此，“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复合的而不是单一的。《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理论是对异化问题的最完备的论述；但它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文集，19～20页）。

第三，关于《手稿》的主题思想问题。对于《手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不是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陈先达认为，《手稿》虽然比较集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但《手稿》的主题，并不是关于这两个问题的抽象思辨，而是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和人类解放道路的论述”（文集，108页），因为《手稿》“研究的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而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剖析的不是两个私有者的交换关系，而是无产者和资产者在生产中的关系。因此《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劳动，而是雇佣劳动”（文集，22页）。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理论的目的旨在揭示其中包含的阶级对抗。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种种分析，如工人同自己产品的关系、同自己劳动的关系、同其他不生产的人的关系等等，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文集，22页）。他认为：“《手稿》的突出成就，就是不

再从人自身、从个体和类的矛盾中探求异化，开始把着眼点转移到经济分析、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剖析的基础上。”（文集，34页）陈先达从《手稿》的表述特点上探讨了人们对马克思《手稿》主题思想误解的原因，他认为关键原因在于人们把马克思《手稿》的主题思想与对主题的论证、《手稿》揭示的经济事实和对经济事实的哲学解释混为一谈。因为《手稿》的特点是：“它一方面以私有制为基础，从经济事实出发；另一方面又求助于人的本质，把历史的发展纳入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思辨图式中，因此对无产阶级地位和彻底解放的论证，带有人本主义的烙印。”（文集，110页）

西方马克思学对《手稿》的主题思想，有三种所谓“新发现”，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其特点是片面强调《手稿》论证方法中的人本主义因素，把人的本质及其实现作为《手稿》的主题和核心。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化，即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伦理社会主义。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化，认为异化理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和中心。陈先达认为这三者的共同倾向都是以《手稿》中的价值因素来否定其中的科学性，“即把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成是一种异化的理论”（文集，125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倾向的实质是通过推崇异化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来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纯思辨体系，从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并力图用‘人’的异化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事实，把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变成抽象的‘人’的解放问题，借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文集，126页）而某些人之所以对西方的人道主义理论大感兴趣，其政治目的在于“根据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个虚构的前提，用马克思的‘名义’来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倒转枪口，把矛头从西方资本主义引向东方的社会主义”（文集，148页）。其最终目标则是引导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前景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文集，148页）。

第四，关于《手稿》的历史地位问题。陈先达认为，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手稿》“既不是对以前发展阶段的偏离，也不是一个天才思想家的灵感迸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必然环节：它标志着从《莱茵报》开始的两个转变的基本结束，又是进一步创

立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开端”（《走向历史的深处》，217页，以下简称“深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沿着《手稿》的方向前进取得的，“离开了《手稿》和异化劳动的理论，我们是无法理解马克思如何创立唯物史观的”（深处，221页）。第二，从贡献的角度看，《手稿》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提出了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问题，即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问题”（文集，270页）。《手稿》的局限性在于“它对自己所提问题的回答还没有达到科学形态，而是表现为一种探索”（文集，271页）。他提出要全面地看问题，在反对过分贬斥《手稿》的同时，也不能人为地拔高。他说：“我们重视《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充分估价异化劳动的成就，但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我们不应该做马克思思想研究中的考古学家。把未发表的《手稿》放在正式出版的著作之上，把青年时代的著作放在后来的著作之上，像挖出土文物一样去‘发掘’马克思自己否定了的看法，未必正确。我们应该做比较解剖学家，通过分析、比较，探求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文集，35～36页）

第五，关于马克思的历史观问题。西方一些学者把早期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晚期的“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对立起来，以前者否定后者，对此，陈先达认为，唯物史观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论精髓。他说：“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规律，把整个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文集，78～79页）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马克思不再把各种经济关系看成‘人的本质’的体现，不再根据‘人的本质’实现的程度来判断经济形式，而着眼于经济过程本身的分析，在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互联结中来考察各种生产关系”（文集，79页）。他还从马哲史的角度纠正了以往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错误认识，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偏重于历史唯物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依赖性，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推广和运用。实际上，它们的形成过程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手稿》表明，要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跨进一步，就离不开唯物主义历史观”（文集，27页），“从异化到异化劳动不是异化范畴的纯逻辑演绎，而是以经济学研究为中介的一次飞跃”（文集，29页）。

第六，关于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问题。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从历史观的角度，马克思主义又是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他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作了区别和界定。“第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世界观，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规范，或者说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人道原则。”“第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第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最高的原则，而是起码的原则，不是唯一的原则，而是原则之一。”（文集，104~105页）他分别从社会政治实践和哲学理论逻辑两个方面剖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内在局限性。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理论上与现实是对立的。“在理论上，它从抽象的人和人性出发，提倡尊重一切人的权利、尊严和价值，宣扬普遍的自由和平等；但在实践上，它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和权利，维护的是私有者的尊严和价值。它在大写的‘人’字后面，隐藏的是渺小的资产者。”（文集，88页）“正因为在人出发点的原则中包含着这种内在的矛盾，因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政治实践中的胜利，必然以理论上的彻底破产为补偿。”（文集，89页）从哲学理论逻辑的角度看，人本主义历史观则根本解释不了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以人性作为历史的尺度，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么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是变化的，那人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始终在这个困难的迷宫里徘徊。强调人、强调以人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道主义者，反而变得不能理解人。”（文集，72页）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以人为出发点，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一种历史必然性，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摒弃这种出发点同样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文集，93页）

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之所以一再强调抽象的人权，把各种各样的所谓自由放在首位，作为人权的核心，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方面的生存权已经解决了，他们要求的是政权，与政权密切联系的自由、民主权。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首先要解决经济基础问题，解决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保证并发展各种政

治权利。这是一个生存权问题”（文集，485页）。陈先达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把人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问题作为一个抽象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处理。不解决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问题，不解决经济和政治制度问题，一切关于人的权利、尊严、价值都会变成一句空话。”（论丛，146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把‘社会主义人道化’奉为改革方针，只能有利于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文集，477页）。为什么西方某些人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为了保护人权可以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

（2）关于哲学理论

第一，关于哲学的本质问题。关于哲学的本质问题，目前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人学”，有人认为是“类哲学”，还有人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也有人认为是“自我意识”。对此，陈先达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争论，是因为人们把哲学问题和哲学本质混淆开来。哲学问题与哲学的本质是两回事，每一时代都有着该时代的哲学问题，哲学史就是哲学问题史，哲学的本质则是对哲学特征的定位。哲学的问题可以随着时代而改变，而哲学的本质则是始终如一的。他说：“一部哲学史就是哲学研究重点的转移史，但哲学仍然是哲学，它决不会丧失它作为世界观的特性。哲学永远不会融化为实证科学。”（论丛，78页）他认为任何哲学问题都是哲学，每一个新问题的提出和解答，都意味着一种新哲学的出现，但哲学不能归结为任何一个哲学问题，“哲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世界观”（论丛，77页），“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就是认识论、就是人学、就是语言哲学或者就是什么什么都是片面的”（论丛，264页）。而“哲学一旦归结为某一具体问题的探讨，它就不是哲学而是具体科学”（《漫步遐思》，48页，以下简称“漫步”）。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依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主义’，而是一个主义，即辩证的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另加上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的强调，即它不是像旧唯物主义那样把历史放在唯物主义之外的半截子的唯物主

义，也不是不彻底的辩证法。它是最彻底最完备的唯物主义，这种彻底性和完备性正表现在社会历史之中，即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论丛，38页）。“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成两大块，完全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论丛，153页）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实践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伪造的，这是西方一些学者多年来为制造“马恩对立论”，用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据。对此，陈先达指出：“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使用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提法。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哲学的过程中曾使用过多种名称，如科学的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实践唯物主义者这个称呼。但我们反对把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立起来，似乎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真正重视实践，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这种观点不仅是动摇而且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丛，155页）“事情很显然，如果否认世界物质性观点，宣扬实践本体论，只承认所谓的属人世界，公然宣称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存在的问题毫无意义，宣称在实践范围之外的世界是无，请问，如何坚持唯物主义、如何反对有神论、反对在可见的感性世界之外存在一个亡灵世界的歪理邪说呢？……试问这种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变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呢？”（论丛，156页）“争论的关键不是名称，而是实质，即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改变或抛弃了这些原理，无论怎样称呼，都只能是名存实亡。”（论丛，369页）

对哲学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观点，陈先达明确表示反对，他说，“不能认为哲学对世界的认识就只是对自我的认识”（论丛，85页），因为哲学决不仅仅是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差别”（论丛，87页）。“如果我们的哲学只在已知世界里打圈圈，把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作为人与世界的唯一关系，就从根本上抽去了辩证唯物主义借以立足的基础，截断了人的实践和认识的来路与进路，人也就被困死在认识与被认识关系的范围内。”（论丛，83页）他认为：“哲

学不能归为人学。因为没有与人无关的哲学问题。哲学研究的问题比人的问题要广泛得多。”（论丛，79页）

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类哲学的观点，陈先达认为，这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角度看人和类哲学从类角度看人的区别，他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类哲学的理论局限。第一，从类的角度看人，容易强调人的同一性，忽视人的社会差异性。他说：“从类的角度看人，除了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即性别和种族外是什么也说不出来的。它的最高的结论是：人就是人，如此而已。”（论丛，91页）而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的差异只能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正确理解。第二，从类的角度看人容易强调类的共同利益，忽视人类社会的利益差别。他用一个最简单的实例入木三分地点出了“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种说法的幼稚性。他说：“人口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可美国却以人权为名反对中国的计划生育。它究竟是要人口多还是要控制人口你无法弄清楚。只要对他们有利，别国的人口多少它并不在乎。”（论丛，92页）第三，从类的角度看问题，把一切问题归结为人的问题，会掩盖问题的本质。他说：“其实妇女问题就是妇女问题，它在不同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内容和解决方式，正如儿童问题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和解决方式一样。”（论丛，93页）

第三，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苏联东欧剧变把社会规律的客观性问题突出了出来，历史发展有无规律成为事关如何理解和看待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大问题，有人提出要用社会选择论代替社会决定论。陈先达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的客观依据及其内涵，具体剖析了选择论的内在缺陷，指出，人们的任何选择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每一代人面临的既成事实都是无可选择的，人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传统。他认为决定论并不否认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选择作用，而是在于承认“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漫步，211页）。“因此，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的东西的选择。”（论丛，111页）“作为个体，主体的行为似乎是自由的、任意的、无规律可循的，可是从群体的角度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主体采取什么行动，归根到底是决定论的，而不是非决定论的。”（文集，451~452页）针对选择论把历史假设当作论据的情况，他批评道：“历

史是由事实谱写的，而不由如果构成的。‘如果’所表达的只是一种历史观，而不是历史本身。”（文集，193页）他指出社会规律在本性上是客观的，“它起作用的范围，不取决于主体的意志而是取决于社会条件。社会规律是一定条件下社会现象之间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它的公式是‘只要有……就有’，只要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只要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供求规律，只要有货币就有货币流通规律。如此等等”（漫步，152页）。

把社会规律论看作是社会宿命论，是混淆了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的区别。陈先达说：“社会中的决定论是辩证决定论，它把主体的作用作为客观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包含在历史必然性之中。有些人不理解，以为只有完全排除主体的作用才叫决定论，这是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社会规律。”（论丛，125页）他批评以两极对立思维方式来看待历史决定论与人的能动选择关系的人，说：“他们在两极对立中思维，或者要选择，或者要规律。他们把选择的可能性空间移到规律之外，越是无规律，选择的可能性就越大；而把规律移到选择的行为之外，只有在无选择可能性的地方才谈得上客观规律。他们不知道规律存在于人们的选择行为之中，是在选择行为中形成的而又不依赖于选择行为。”（漫步，157页）他说：“社会决定论不同于机械决定论。它不是单一的因果关系，而是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社会必然性的实现，表现为两种可能性的斗争，究竟哪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取决于主客观条件。”（文集，195页）

第四，关于发展经济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这涉及如何看待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陈先达认为单纯地撇开具体历史环境，就理论而理论进行比较是永远得不出正确答案的，关键在于对现实时代课题的把握。他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例，指出发展生产力与进行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都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是非标准判定的。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但在革命时期我们却要反对庸俗生产力论，因为不反对就不能革命。阶级斗争理论是我们战胜蒋家王朝的法宝，但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如果还把阶级斗争放在中心地位，就不能迅速发展经济，就不能摆脱贫困，就会使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不能显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确看

待发展经济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表面上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实质上是怎样认清我们所面临的时代任务，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现实问题。

第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问题。陈先达认为马克思主义依然是现时代的旗帜。这是因为在当今存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主题并没有改变；现代科学技术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举出任何一条材料证明马克思主义某一条原理是错误的。例如，有什么材料证明认识不来源于实践……”（文集，408页）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陈先达认为，真理是不会过时的。“认识的可靠性是以其中包含的真理性颗粒为尺度，而不是以出现的时间长短为准则。在认识史上可以有古老的真理也可以有最新的谬误。”（论丛，15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正因为它是真理，是科学。他从现实的角度具体剖析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原因，指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不在于马克思主义，而在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上，先是教条主义，然后是彻底背叛。“如果说斯大林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和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问题，如何在俄国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在他之后则逐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口号下，把马克思主义也当作教条主义来反对。从没有结合好到放弃结合，放弃马克思主义，最后则公开走向取消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论丛，305页）针对苏东剧变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思潮，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运用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不能以后者的失败来否定前者。他说：“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造成的错误，丝毫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信’和‘形象’。”“我们决不能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认识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头上。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出解决一切问题的结论，责任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在于自己的无知。”（论丛，65、64页）他认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反复，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而是实际运动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实质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或过时，而恰好是因为某些执政党和它们的领导者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逐步走向背弃马克思主义，背弃社会主义而造成的挫折和暂时